

2 2

今期的「二 一世紀評論」一欄刊載了兩篇文章。謝岳的文章探討了當前中國地方社會精英政治化的問題。隨著這些社會精英經濟財富的增長，他們不但未能如西方中產階級般成為民主運動的進步力量，反而成為反民主的因素。他們一方面在地方政治發展中阻礙了公民社會的成長；另一方面，他們和地方政治精英的聚合，既阻隔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，又抑制了民間力量的生長，加劇了國家與社會的緊張關係。二 世紀90年代以來，中國地方政治秩序的不斷惡化，與精英發展的反向邏輯不無關係。周長煥的文章是從文化論研究方法的符號學模式的角度出發，導出中國文化代碼，並考察由它形成的中國政治的一些特徵。所謂的「中國文化代碼」，是指形成於中國軸心革命之後、定型於秦漢時期的「以世俗秩序為中心、追求與超越秩序相和諧的一元論」文化代碼，儘管在近代與西方文化之間產生交流和衝突，但它仍然是當代中國的意義體系的基礎。而在政治領域裏，中國文化代碼所具有的非理性化和現實主義傾向形成了人治、權威主義和實用主義、實力政治等特徵，並且這些特徵無論在傳統中國還是當代中國都非常明顯的。

「人文天地」欄目中，陳祖君回顧詩人洛夫的詩作 《石室之死亡》。雖然該詩已發表了接近四 年，但詩學界仍然爭論不休。作者指出這些批評其實與台灣的現代詩爭論有關；可是，綜觀三 多年來的爭論，真正稱得上「論」的文章不多。今天我們有必要用文學史的眼光，探究洛夫詩歌對於整個二 世紀中國文學運動中的真實意義及美學意味。傅書華也在今期回顧當代的中國文學史當中，「 七年文學」的主要代表作 《創業史》。作者從該書的人物形象分析，探討個體投入整體的原因，及被「整體」排除在外的個體生命的殘損形態。由作者細緻的分析，讀者可以理解這一代中國人的人生歷程與精神生命。此外，今期刊登高全喜討論休謨政

治經濟學論文的最後部分，讀者如欲回顧發表過的其他部分，請登入本刊的前期目錄。

官場的貪污問題一直是社會人士深惡痛絕的問題，歷任政府都致力予以打擊，但始終未能根治。在「政治與法律」欄中，繆心毫以乾隆朝浙江平陽知縣黃梅的一樁勒派入己案作為研究對象，細述其頗為曲折的歷程。戶部尚書曹文植與浙江學政竇光鼐在查辦此案中發生意見分歧，彼此爭相利用民意作為政治資源，塑造出民意的不同版本。案件雖然最後得到審結，但漫長的過程本身即提供了貪污得以存在的土壤，乾隆朝貪污懲治機制所發揮的效果十分有限。劉志強的文章則介紹了上個世紀二、三十年代的人權活躍份子羅隆基的人權理論。羅隆基不僅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和個人獨裁，也不同意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反對中共革命，結果他同被國民政府和共產黨視為「反動」人物。羅隆基有關人權理論的論述，到今天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
在「批評與回應」欄中，任軍的文章批評了秦暉提出的「大共同體本位論」，認為他把傳統中國社會斷然指為「大共同體本位的『偽個人主義』社會」，有理論上的認識偏差，也不符合歷史事實。無論是西方前近代社會還是中國傳統社會，都不存在大小共同體的絕對對立，意即無所謂本位問題。社會現代化指向現代公民社會，並不一定是西方模式的，而大共同體與小共同體的關係和各種小共同體普遍的「族性」特徵，從根本上說明了傳統中國社會即不是以大共同體為本位，也不是以小共同體為本位。